

刘清, 杨永春. 基于独特资源的敦煌城市旅游建设及治理过程 [J]. 地理科学, 2023, 43(8): 1401-1409. [Liu Qing, Yang Yongchun. Urban tourism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unique resources in Dunhuang,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8): 1401-1409.]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8.009

基于独特资源的敦煌城市旅游建设及治理过程

刘清¹, 杨永春^{2,3}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3.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基于访谈录音文本与各类统计数据, 采用行动者网络方法, 研究敦煌旅游建设治理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敦煌的旅游治理可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 2 个阶段运作过程。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 莫高窟与敦煌学的全球声望吸引大量入境游客, 市政府与敦煌研究院通过征召方式动员其他行动者, 实现敦煌旅游供给; 在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阶段, 市政府统一收编市属旅游资源建立国企进行集中市场化运作, 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大事件, 发展敦煌文化旅游与智慧旅游。过程中异议与博弈主要围绕市场监管与利润分配、土地利用、资源开发展开。敦煌研究院保护弘扬敦煌石窟文化为敦煌旅游注入生命力, 市场驱动敦煌遗产旅游的社会参与与旅游供给, 不同层级政府驱动敦煌的集中化治理与文化资产存量发展。

关键词: 旅游治理; 独特资源; 行动者网络; 敦煌; 城市转型

中图分类号: K901; F5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3)08-1401-09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旅游业的建设治理是推进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典范之一^[1]。城市旅游的良好治理会促进城市产业、空间转型, 实现城市财富创造与收入再分配, 增强城市文化景观塑造与居民文化身份的认同^[2]。中国西部城市敦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枢纽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国际旅游城市,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西部开放窗口与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简称文博会)的永久会址。起初敦煌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 因为境内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 尤其是人类艺术宝库莫高窟这种独特资源,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经过 40 多年的旅游建设治理, 最终成为成熟完善的旅游市场。

旅游目的地治理及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协调关系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 现有关于旅游治理的文献主要聚焦以下领域: ① 旅游环境治理。旅游开发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存续成为环境治理的主题。一方面, 环境正义、环境伦理、环境冲突成为

利益相关者动态博弈的焦点^[3-4]。旅游环境问题会引发种族、阶层关系、环境权利的非正义分配, 并扩展到民生、产业升级等综合治理^[5-7]。同时, 对环境正义空间与风险空间的监测与评估, 也会提升公众的环境伦理认知旅游治理部门的权力重组^[8-9]。另一方面, 环境治理也强调与社会、经济、文化多方耦合, 尤其对生物多样性和地方可持续升级^[10-11]。② 旅游经济治理。第三方旅游企业/组织介入下的市场化也推动旅游治理。一方面, 旅游商品化过程中的资本空间生产, 可以为旅游产业注入市场活力^[12], 也是当下政企合作治理的主要形式^[13]。政府往往赋权引资于中小旅游企业、大型旅地产开发商、旅行社这些私营市场主体来开展商业运作与市场营销^[14]。此外, 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也会给景区旅游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关注热度、保护屏障与招商引资契机^[15], 尤其是文化遗产地建设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 增强了景区的旅游影响力, 推动小企业的市场化参与^[16]。③ 旅游社会文化治理。该领域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7-13; 修订日期: 2022-11-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8, 41571155)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71198, 41571155).]

作者简介: 刘清(1995—), 女, 甘肃华亭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城市转型、电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E-mail: liuq527@mail2.sysu.edu.cn

通信作者: 杨永春。E-mail: yangych@lzu.edu.cn

主要聚焦在空间生产、正当性、地方文化保护治理内容^[17]。第一,空间生产理论下的社会治理与地方性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乡村旅游带来的社区转型、文化节事与实景演出、创意艺术与旅游,成为探讨社会与文化治理的主要维度^[17-19]。第二,行动者网络与语义分析下的原真性、公民性是社会文化治理的重要维度。地方文化依恋与原真性存续是旅游文化治理的核心^[20],村民的社会参与、权益分配与社会融合是社会治理的基础^[21]。④ 旅游政治与空间治理。旅游治理中也越来越重视政府职能与公信力研究^[22]。一方面,在西方自由市场化经济与分权化治理下,政府通过事权下放与顺应市场规律的“无为而治”,实现对旅游市场的合理引导^[22-23]。并向企业型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更强调资本的运作与开发商的社会资产活化^[21]。另一方面,空间治理与尺度政治是政府干预的主要推力。对于特定旅游区域的空间治理,尺度重组与制度嵌入实现了地方政治互动^[24],领域政治也带来社区空间治理转型^[25]。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主要从旅游治理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视角出发,对景区的治理体制、模式、外力介入影响进行研究,但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些许空白:① 从研究对象与维度说,现有研究基于一旅游景区/社区/乡村旅游展开某一维度的治理,对一个城市依托独特资源带来产业结构嬗变,并辐射到整个城市体系转型下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经济耦合治理的研究尚缺乏;② 从经济与政治治理下的政企关系说,现状研究主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逻辑下,政府的分权化治理与赋权于私营资本企业的开发运作,对于政府集权化治理与干预、赋权于国企运作的治理模式尚待厘清。因此,本文以敦煌为例,通过行动者网络研究敦煌旅游建设治理的历程与治理驱动机制。选择敦煌作为旅游治理案例的独特性在于以下 2 个方面:第一,资源驱动的独特性。敦煌的旅游治理更加强调独特资源先天禀赋性与事件触媒性。敦煌的独特资源是城市建设与转型的内核驱动力,当下这种围绕一份独特资源,继而辐射整个产业体系转型并带来城市系统嬗变的治理案例仍是相对缺乏的。第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敦煌的旅游市场是政府集中市场化治理与国企运营的结果,表现为“政府集中化管治+有限市场化”的混合治理模式,是政府在走市场化的路

径主导旅游运作而非企业的市场化路径,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地方实践。鉴于此,本文回答的问题为:敦煌如何依托独特旅游资源组织旅游治理体系,构建一个成熟运作的旅游市场以实现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在不同阶段关键行动者的目的与职能又发生了什么转变?探索这些问题,理论上为当代城市旅游治理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新思考,实践上敦煌的治理模式也为当下中国旅游城市的建设及市场治理提供参考。

1 案例地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敦煌市是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的县级市,全市人口约 20 万人,市辖 7 镇 2 乡^①,分别为: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七里镇、月牙泉镇、阳关镇、郭家堡乡、黄渠乡。沙洲镇是敦煌市委、市政府驻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敦煌气候干旱少雨,位于党河和疏勒河下游最大的绿洲上,被沙漠戈壁包围(图 1)。再者,关于敦煌的旅游资源分布。敦煌旅游分为东西线,其中,东线是市域旅游线路依托敦煌机场、柳沟至敦煌的高铁连接旅游景点,西线是市郊旅游环线与支线,主要依托敦煌至红柳河铁路连接旅游景点。总体上,敦煌旅游资源富集,同时具备不可替代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

1.1 数据与调研

本文的研究数据有两大部分:① 敦煌市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数据。访谈对象包括敦煌市政府、敦煌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化博览局、文博会展事务中心、大景区管委会、月牙泉镇政府、敦煌文化旅游集团、中国国际旅行社敦煌分社等工作人员及本地居民。用录音与现场笔记形式记录,最后整理为录音文稿与笔记,作为本文一手数据。② 敦煌市相关统计数据与规划文本。包括 2010—2019 年《敦煌市统计年鉴》^①、敦煌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①、《敦煌研究院年鉴》(2005—2017)(<https://kns.cnki.net/kns8?dbcode=CYFD>)、敦煌市发改委的敦煌“十三”规划、敦煌市旅游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及专题报告等,作为本文的二手分析数据。在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进行了为期 19 d 的敦煌市旅游建设治理的连续性实地调研。调研依托敦煌旅游治理机制的访谈问卷,发出 58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2 份。

① http://www.dunhuang.gov.cn/dunhuang/dh12/common_index_list.shtml [2020-1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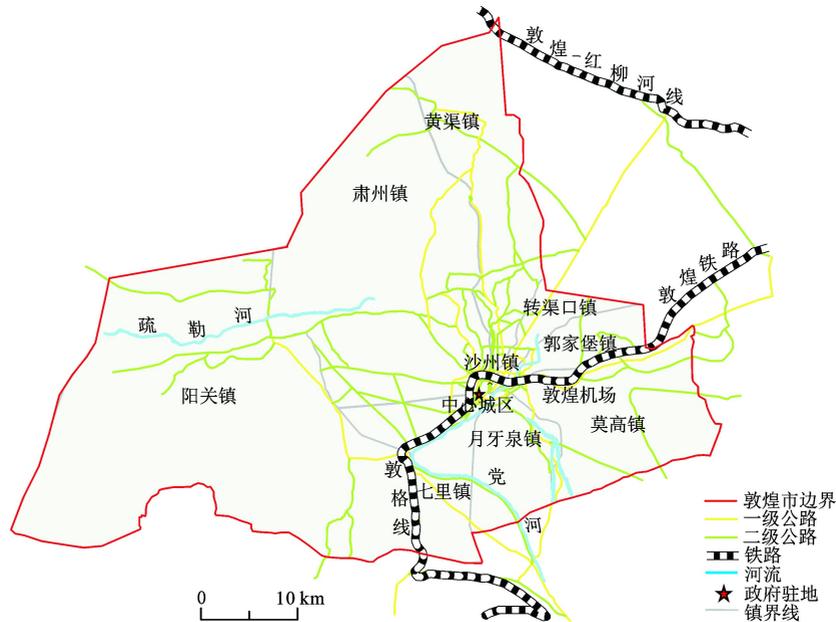


图1 敦煌市地理区位与区域概况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overview of Dunhuang City

访谈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敦煌对外交往的典型时期、发展历程及标志性事件、不同时期敦煌旅游治理的表现、行动和影响机制, 现今游客来敦煌旅游的动机、旅游感受等。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26], 深入剖析敦煌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和集中化运作与城市营销阶段的行动者网络构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又称解译社会学, 是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一项科学实践研究方法^[26]。ANT理论的关键组成是行动者、转移与异质性网络, 并且基于广义对称原则, 将人类与非人类要素都纳入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中。转译是ANT的核心, 由问题呈现、征召、利益赋予、动员、异议5个部分构成^[26]。并在转移的初期, 所有角色的问题都聚集在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 OPP), 以期达成集体共识获得利益预期。最后通过转译过程, 行动者共同联结成异质性网络, 它表征实体间复杂的异质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不是最终结果, 而是一系列可以被定义、转移和影响的行动, 可以说, 转移过程是网络动态变化的表现。

敦煌旅游治理既是基于独特旅游资源这种非人类行动者的驱动, 也是人类行动者等多元异质主体在旅游市场与社会关系建构一系列实践的结果, 这符合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20]。另外, 敦煌依托

莫高窟与敦煌学, 实现了基于旅游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城市转型, 这是多方行动者征召、动员独特资源所形成的运作网络, 具备关系化、异质性、共同利益导向等特征, 因此本文选择ANT理论洞察敦煌的旅游治理过程与互动是合理且适用的。

2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敦煌旅游建设治理过程

敦煌的城市转型总体可分为“建设”与“治理”2个阶段: ①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1979—2008年)和集中化运作与城市营销阶段(2009年至今)。这样划分是基于旅游驱动力与城市治理模式。首先在第一个大阶段, 是一种最初由外力驱动所驱动的旅游市场建设。而在治理模式上, 更多是一种政府鼓励下的民间旅游市场自由发育与分权化引导治理。②敦煌基于国际大事件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外部因素, 以及自身旅游市场需要开始集中化运营和营销文化旅游, 这是一种内外力量联合驱动的旅游市场治理。在治理模式上, 政府也转向了官方的、正式的集权化治理与干预。

2.1 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转译: 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

1) 行动者构成。在敦煌世界文化遗产目的地建设阶段, 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敦煌市政府、敦煌研究院、国际旅行社、本地居民、游客,

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敦煌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交通设施、土地与住房。

2) 转译过程。问题呈现、利益赋予与 OPP。在转译初期,各行动者都遭遇了发展障碍,期望解决问题以实现利益最大化。① 中央政府。莫高窟地处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造像、壁画、洞窟久遭风沙、干旱、病虫侵蚀。众多敦煌文物流落海外,中国敦煌学发展并未占有话语权。因此,中央政府期望通过敦煌文物的保护以及敦煌学的传承弘扬,实现人类佛教宝库的永久存续以及增强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的话语权。② 敦煌市政府。地方政府期望借着敦煌开放旅游的契机,利用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实现区域增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城市转型。③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承担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及其附属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的职责。敦煌研究院期望通过国家支持与国际学术合作交流,实现石窟文物的修复和永久保存、跻身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前沿。④ 国际旅行社。国际旅行社期望优化网络运营与宣传模式,开拓国内外游客市场获取利益。⑤ 本地居民。当地居民以特色林果与棉花种植营生,但利润微薄。居民期望通过参与旅游市场,提升居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⑥ 游客。对于对敦煌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团体和游客,像莫高窟这样经过 1 600 a 连续营建的人类艺术宝库^[27],可供旅游与研究的目的地很少。但当时敦煌落后的交通、匮乏的住宿餐饮条件,对游客可达性带来困扰。⑦ 非人类行动者。敦煌地处沙漠戈壁,历史文化遗产易受风沙侵袭、病虫危害需要修复与保护;交通设施落后,国际直

飞航线、动车缺乏,外国游客可进入性极低;城市景观风貌较差,外国投资引入难度大。通过对这些非人类行动者的合理保护、建设、整治,以期实现资源的保护传承、有序利用与协同发展。最终,敦煌市政府确立敦煌以旅游为龙头产业的城市转型路线,汇集各方行动者的问题障碍与利益诉求,最终达成一个集体共识,集聚到“发展敦煌旅游,实现农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的强制通行点(OPP)上,通过整治提升城市风貌,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多方参与治理敦煌旅游市场,实现敦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目标(图 2)。

征召与动员。具体的征召与动员途径如下。① 行政征召与动员。敦煌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对外开放旅游城市,西部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由此征召敦煌地方政府对旅游事业全方位落实。此外,敦煌研究院一直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省直单位,自 1981 年开始历届国家领导人来敦煌研究院与莫高窟开展视察工作。在中央指示与保护莫高窟文物的国策下,经过敦煌研究院工作者的努力,敦煌文物保护一直在扎实推进。② 环境征召与动员。在敦煌“旅游立市”的发展政策指引下,敦煌市政府号召各镇政府,着力于改善城市景观风貌、绿化卫生与社区居住环境,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地与历史文化名城。③ 独特资源征召与动员。敦煌丰富独特的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吸引了英国 BBC、日本 NHK、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取景拍摄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并有众多国内外敦煌学学者、团队撰写研究专著、小说、诗歌及散文。

3) 治理维度。敦煌市政府通过引导支持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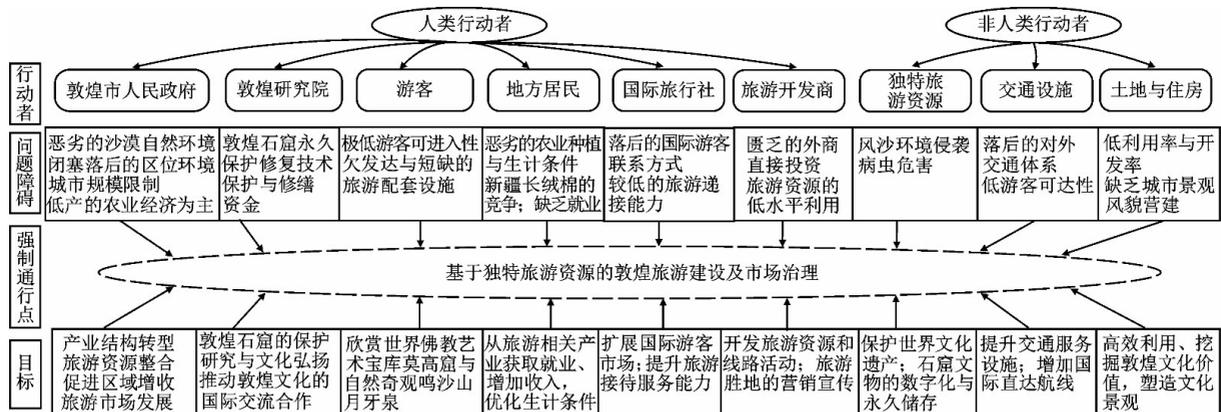


图 2 敦煌旅游建设治理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2 The main actors and OPP i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in Dunhuang's tourism

行动者参与旅游市场, 形成一个民间自发的旅游治理市场, 具体的治理维度如下: ① 政策支持与空间治理。首先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 敦煌市政府自 1982 年编制各类旅游规划, 大力兴建旅游配套设施。还出台以下相关政策鼓励其他行动者参与旅游市场, 具体为: 政府鼓励居民参与旅游交通服务, 降低出租车准入门槛, 并设立星际评选活动; 鼓励居民修建宾馆、饭店、客栈与民宿, 用激励机制推动农户加大特色水果种植; 莫高窟保护的资金支持。中央与省级政府多次通过财政划拨支持莫高窟保护研究, 此外平山郁夫先生成立“平山郁夫学术基金会”以及“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倪密·盖茨成立美国敦煌基金会, 资助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保护研究。② 环境与风貌治理。1979—1985 年敦煌市政府进行城市广场与公园绿地建设, 先后建立了敦煌公园、沙洲乐园、祥云广场、飞天迎宾广场、党河风情线等。③ 招商引资与经济治理。敦煌市政府通过低廉的土地价格、投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本到敦煌建立星级宾馆酒店, 如港台资投建的敦煌山庄、太阳大酒店、沙洲阳光大酒店、天河大酒店。④ 文化宣传与治理。敦煌研究院是向外推介敦煌文化的主力与核心行动者。具体方式如下: 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保护机构、高校开展保护研究、技术合作与研究生交换培养; 举办国际展览。敦煌研究院在全球布展, 涉及壁画展、文物展、世博会图书展、文化创意产品展等; 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接待。主要包括境外考察、国际会议与论坛以及研究院接待各国政要、国家代表团、国际组织、学术团队、学者等众多外宾; 数字敦煌^①项目。研究院与众多国内外

研究机构合作, 利用计算机数字技术永久、高保真地保存敦煌石窟文物珍贵资料。

2.2 行动者网络的重构与发展: 集中化运作与城市营销阶段

1) 关键行动者的意图改变与不同行动者的进入退出。通过转移过程的推进与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嵌入, 出现了新的行动者网络重构与转译(图 3)。一方面, 敦煌的旅游市场仍然目混杂且以民间自发行为为主, 缺乏政府强有力的管治。尤其几年来敦煌“天价厕所”等居民宰客行为一定程度影响了敦煌的旅游形象, 一个更加成熟规范的旅游市场治理迫在眉睫。另一方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敦煌世博会提出, 敦煌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城市营销, 打造国际旅游城市新名片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治理议程。因此, “规范高效治理旅游市场, 深度挖掘运作文化旅游”成为这一阶段的必经之点(OPP)。

另外, 伴随着新的发展议题和城市治理再定位提出, 关键行动者的意图随之发生改变。首先, 敦煌市政府由以往为各方行动者提供政策引导与参与鼓励的支持者, 转变为对旅游市场进行全面介入与干预的主导者, 敦煌研究院在对敦煌石窟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开发文化生产力, 探索数字化保护运营与开放式创新模式。同时, 也出现一些新的行动者进入或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行动者退出。敦煌文化旅游集团是最为典型的新进入者, 敦煌市政府通建立国企敦煌文化旅游集团, 是敦煌市政府走市场化运营的产物。以晨光旅行社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电商”国际旅行社也成为重要的新进入者。相对应, 中国国际旅行社敦煌分社由于国企较僵化的运营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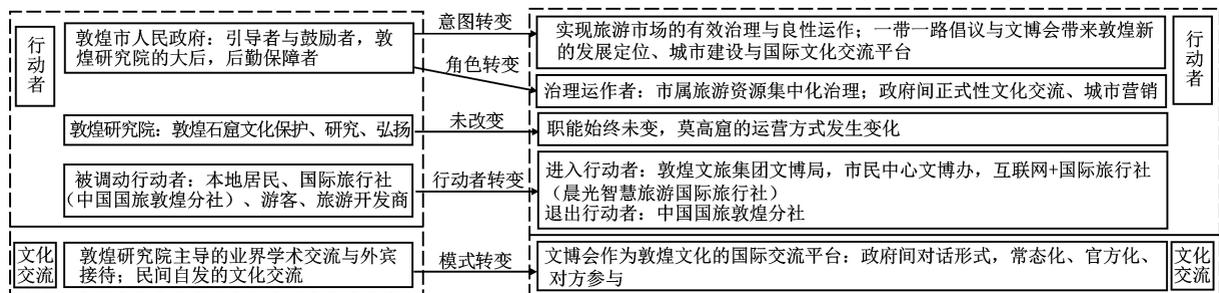


图 3 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集中化治理两阶段行动者的目的职能转变

Fig.3 The change of intention and function of actors in the two governance stage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construction and centralized operation

① “数字敦煌”项目自 1980s 年代由樊锦诗院长提出, 1990s 年代开始研究应用, 旨在利用先进科学技术, 对敦煌石窟及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 建立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数据库, 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向全球分享, 实现敦煌文物的永续保护利用。

式以及单一的递接中介业务,不能很好的适应新发展趋势,在这一阶段逐渐退出了旅游市场。

2) 集中化治理过程。敦煌通过对旅游市场的集中化治理推动行动者网络重构,过程如下:① 敦煌市政府成立文化旅游集团,集中化运作市属旅游资源。2016年在一家智慧旅游企业基础上建立国企文化旅游集团,建立了集团化、市场化运营旅游资源的模式。此外,敦煌文化旅游集团对整个敦煌旅游市场进行严格有序的管控监督。通过大数据为经营户建档与分发驼号,数字化重建沙洲夜市摊位,开发多项景区活动,如雅丹汽车拉力赛、鸣沙山的滑沙节、沙漠露营、戈壁徒步、摩托冲浪等。②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的文化旅游治理。敦煌市政府以文博会为推手,将敦煌旅游也上升到正式的、政府间交流层面,城市风貌与新业态有了长足发展。在城市风貌景观存量发展方面,自文博会以来,敦煌城市建设都是围绕敦煌文化元素做文章,城市景观小品采用飞天、反弹琵琶、九色鹿、藻井、莲花、三兔、迦楼罗等莫高窟纹样,精心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在新兴的文化产业交流与业态发展方面,第一,研学旅游的兴起。自文博会始,也引起敦煌旅游“研学热”。研学由敦煌研究院最先发起,并成立莫高重华研学公司负责研学项目的开发设计。之后,敦煌文化旅游集团成立莫高宏杰研学公司,统筹运营鸣沙山、雅丹等自然地貌研学游以及悬泉置、阳关、玉门关等历史遗迹研学游。第二,敦煌的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这主要由敦煌文化旅游集团及敦煌研究院的自主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设计推动。第三,文博会孵化出“会展业”,派生出一系列产业链。文博会期间的游客潮带来一系列的消费需求,生活、娱乐以及办活动的场馆租赁,这些由于国际节事所拉动的产业链消费也称为会展业。

3) 异议与排除异议。虽然在整体新的敦煌旅游治理需求上行动者联盟可以达成共识,但是在实践方式上异质行动者存在较大异议。第一,表现在沙洲夜市的商贩对市场监管局和敦煌文化旅游集团集中化市场管理和征税方式提出异议。自从政府委托此国企统一接管沙洲夜市后,官民利益冲突是持续发酵的。一方面,商贩对敦煌市政府和敦煌文化旅游集团收取整改费的行为不满,因为这种数字化改造许多商贩是不愿意的。另一方面,商贩营业收入都是在划扣敦煌市政府和敦煌文化旅游集团的沙洲夜市管理费后返还所得,他们认为现在这种2层

收费极大的压榨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在这些商贩间歇性的异议与不满下,敦煌市政府和敦煌文化旅游集团减少整改与管理费用,冲突矛盾得以缓和。第二,景区附近村民与镇政府的土地利用与控制异议。随着敦煌旅游开发与游客热,敦煌旅游景区附近的村民开始大规模自建改建民宿客栈,为外来游客提供住宿服务或将自有客栈出租给外来开发商。但由于村民的过度无序开发自有宅基地,利用此“擦边球空间”逐利,导致景区附近违章建筑泛滥,已严重影响了风景名胜区的整体村镇风貌。这种现象显著表现在月牙泉镇政府与月牙泉村、鸣山村村民,以及阳关镇政府与龙勒村村民之间。基层政府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加以管治乡村的住宅空间扩张问题,并对违章住宅进行罚款或者勒令拆除,但总体的推进阻力依旧较大。另一方面的异议主要围绕着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地方政府对一些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建设落地性不强,引起了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尤其是,敦煌小镇等此类文化项目与周围景观割裂严重,且区位不佳,很少有游客前来参观游玩,一度经营惨淡逐渐被闲置,最后改为出租场地作商业用途。部分居民认为这是对土地、资源、人力财力的浪费与低效开发,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3 敦煌旅游治理的驱动机制

敦煌的旅游治理与城市转型是多元化行动者共同驱动的结果,主要有敦煌研究院、市场与不同层级政府驱动力,通过不同的行动开展敦煌旅游治理实践。

1) 敦煌研究院保护弘扬敦煌石窟文化为敦煌旅游注入生命力。作为社会文化治理的重要维度,敦煌研究院是保存敦煌旅游内核和延伸了敦煌旅游周期的关键。其贡献主要在:第一,秉承“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排除万难,守护祖国璀璨的敦煌艺术的精神。正是因为敦煌研究院人员在敦煌文化的深耕与保护,以及可持续的延续敦煌石窟的存续周期,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敦煌旅游的生命力。第二,敦煌研究院代表着敦煌文化旅游挖掘、研学产业、敦煌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的最高端水平。第三,通过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的研发合作、学术交流与布展,以及对国内外重要政要、团体、商界精英的接待,向世界展现中西丝路文明交汇下的佛教艺术圣地,塑造了敦煌的旅游文化身份。

2) 市场驱动敦煌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中的社会参与旅游供给。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维度, 旅游市场红利成为敦煌实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的核心驱动力。① 市场动因促进了全民参与敦煌旅游业发展。基于旅游市场存在的更大的经济反馈与消费红利, 本地居民与外来商贩都增强了在吃住行游购娱 6 个方面的社会参与, 以期从服务业经济中获得更大的生计利润。② 旅游市场也重塑了敦煌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将旅游业发展作为自身利益的延伸, 加大了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与范围, 对旅游市场利润也掌握了更大的分配权。③ 立足于短视频时代与流量市场的极高热度, 敦煌文化旅游集团基于这种新兴的旅游市场偏好, 通过创新开放自由的业态推广模式, 革新了敦煌智慧旅游发展模式。

3) 不同层级政府驱动敦煌集中化治理与文化资产的存量发展。作为政治治理的重要维度, 敦煌旅游市场的完善是中央政府、省政府和敦煌市政府联合行动与层级性配置的产物。① 中央政府的意志聚焦通过顶层设计敦煌发展的主体方向。一是通过上层规划设计定位敦煌走旅游城市转型路线, 向世界开放敦煌旅游; 二是立足于“一带一路”国家级的顶级合作倡议, 深化与西部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提出每年举办文博会的计划, 敦煌是永久会址, 发挥敦煌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桥梁作用。② 区域政府通过对中央政府的回应性配置, 从上位规划、事权下放、财税分配实现对敦煌旅游的区域管治。第一, 通过设计敦煌旅游的上位规划, 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与全域旅游。包括规划整个敦煌东西线旅游和甘青大环线, 给予较大的政策与配套设施支持; 第二, 作为文博会的主办单位, 成立甘肃省文化博览局, 统筹其他省级政府部门营销运营此重大节事。通过财税制度加大对敦煌文博会的财政分配支持, 依托专项转移支付形式保证建设资金。③ 地方政府体现回应性配置和自主性配置。第一, 制定“旅游兴市”的具体政策; 第二, 地方政府承担了 3 类角色: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重大项目启动者、浓郁氛围营造者。第三, 体现出地方弹性, 统一收编开发除莫高窟以外的市属旅游资源, 发展智慧旅游与社交媒体、网红打卡、流量加持来推广营销敦煌旅游。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敦煌旅游建设治理可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建

设、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 2 个阶段的运作过程。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 莫高窟与敦煌文化的全球知名度吸引大量入境游客, 市政府与敦煌研究院征召动员其他行动者从不同治理维度实现大规模旅游需求供给; 在集中化运营与全球化营销阶段, 市政府建立文化旅游集团发展智慧旅游进行集中市场化运作, 并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文博会, 通过城市营销治理发展文化旅游。治理的核心是敦煌文化不断被重组和诠释, “文化景观”正被重新包装成新的视觉元素和街头叙事以提高其对游客和居民的文化供给。这一过程中的异议与动态博弈主要围绕着市场监管与利润分配、土地利用、资源开展展开。对于旅游治理的驱动机制, 敦煌研究院维系敦煌石窟可持续旅游的生命力, 市场驱动敦煌遗产旅游建设中的社会参与与旅游供给, 不同层级政府驱动敦煌的集中化治理与文化资产的存量发展。

4.2 讨论

敦煌的旅游治理是一个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维度耦合的结果, 最终实现了一个系统的产业变迁与城市转型。就环境维度而言, 敦煌的旅游治理极大的提升城市社会生态效应, 表现在人居环境的更新、自然环境与资源储量的可持续开发、石窟遗产的保护规划以及向无烟化轻产型服务业经济的转变。对于经济反馈, 主要体现在政府集权化治理+有限市场化的探索。政府逐渐统一收编运作, 是一个由分权化向集权化的治理过程。同时, 在互联网企业的基础上整合国有资产建立一家国企, 作为独家运用的执行者, 是政府干预控制性的市场化尝试。从社会文化维度来说, 首先敦煌的旅游治理提升了公众的行业参与, 各行各业的民众都可以参与旅游行业, 尤其是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也推动敦煌居民实现阶层转换与身份变迁。再者, 敦煌的文化旅游挖掘与文化资产存量发展, 也上升到与一带一路国家政府间的顶层对话与合作。最后, 政治维度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联合行动。除了上位政府的层级性配置与回应性配置, 地方政府极大的发挥了地方能动性, 这种政府公共权力治理模式与以往旅游开发中私有化与自由市场主义下的资本运作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Zmysłony P. Globalization, tourism and cities: Pros and cons[J]. *Folia Turistica*, 2011, 25(1): 299-312.

- [2] Mpfu T.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globalization in Africa[J]. *Journal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 Planning Research*, 2009, 3(1): 10-17.
- [3] Wenz P S. Environmental justice[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 [4] Holden A. The environment-tourism nexus: Influence of market ethic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373-389.
- [5] Bullard R D.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0.
- [6] Sharma-wallace L.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f the rural-urban interface[J]. *Geoforum*, 2016, 77: 174-177.
- [7] 孙九霞, 陈景, 黄秀波.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J]. *地理科学*, 2020, 40(9): 1468-1475. [Sun Jiuxia, Chen Jing, Huang Xiubo. The bargain between subjects and rights negotiation i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 of Erhai in Dali.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9): 1468-1475.]
- [8] Holifield R.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risk assessment: Negotiating and translating health risk at a superfund site in Indian Countr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3): 591-613.
- [9] Duan B, Hicks C C, Cinner J E et al. Marine tourism in the face of global change: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to crises in Thailand and Australia[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5, 105: 65-74.
- [10] Chung M G, Dietz T, Liu J. Glob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based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J]. *Ecosystem Services*, 2018, 34: 11-23.
- [11] Fei J, Lin Y, Jiang Q et al.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on islands' economy-environment-tourism system[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20, 212: 1-8.
- [12] Fløysand A, Jakobsen S 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places: A narrative of social fields, rural development, and footbal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206-221.
- [13] Akbaba A. Understanding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A perspective from Turkey[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19(1): 31-47.
- [14] Peng H, Zhang J, Zhong S 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tourism firm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8(6): 163-173.
- [15] 尹寿兵, 刘红婷. 国际旅游组织介入背景下山岳型景区治理演化路径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5): 1316-1333. [Yin Shoubing, Liu Hongting. Research on governance evolution path of mountain scenic spo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5): 1316-1333.]
- [16] Wang L, Xiao S. Tourism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Shibing Karst of the South China Karst World Heritage Si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heritage and Parks*, 2020, 8(2): 140-151.
- [17] 温士贤, 廖健豪, 蔡浩辉, 等.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 广州永庆坊案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61-170. [Wen Shixian, Liao Jianhao, Cai Haohui et 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bloc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qing Fang, Guang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61-170.]
- [18] 王楚君, 王亚力, 向小辉. 山水实景演出的空间生产研究: 以《桃花源记》实景演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1, 41(2): 310-318. [Wang Chujun, Wang Yali, Xiang Xiaohui. Research on space production of real-scene performing art: A case study on 'The peach colon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310-318.]
- [19] 吴焯佳, 解佳, 孙九霞. 少数民族传统节事商品化: 行动主体及微观权力运作[J]. *经济地理*, 2019, 39(5): 217-225. [Wu Wenjia, Xie Jia, Sun Jiuxia.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inority ethnic traditional festivals: Actors and their micro-power practi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5): 217-225.]
- [20] 周尚意, 苏娴, 陈海明. 地方性知识与空间治理——以苏州东山内圩治理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33-1342. [Zhou Shangyi, Su Xian, Chen Haiming. Local knowledg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Dongshan Town, Su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333-1342.]
- [21] 翁时秀, 卢建鸣.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22-1332. [Weng Shixiu, Lu Jianming. The local practices and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in spat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in Furong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322-1332.]
- [22] 刘卫东.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09-1116. [Liu Weidong. Economic Geography for spatial governa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09-1116.]
- [23] 杨昀, 保继刚. 阳朔“西街现象”的形成机理分析——旅游地发展中的游客理性消费与政府“无为而治”[J]. *地理学报*, 2016, 71(12): 2199-2111. [Yan Yun, Bao Jigang.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 Street Phenomenon" in Yangshuo: Tourists' rational consump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non-interfering governance in guid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t destin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2): 2199-2111.]
- [24] 韩炜, 蔡建明, 赵一夫.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0): 1730-1745. [Han Wei, Cai Jianming, Zhao Yifu. Structure, mechanism, and paths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metropolitan fring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subjec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0): 1730-1745.]
- [25] 刘云刚, 叶清露. 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领域化与领域政治——基于东莞东泰社区的案例研究[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83-296. [Liu Yungang, Ye Qinglu. Territori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the urban grassroots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Dongtai Community in Dongguan C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283-296.]

- ica, 2015, 70(2): 283-296.]
- [2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5-174.
- [27] 徐瑞红, 武发思, 汪万福, 等. 敦煌莫高窟大气可吸入颗粒物的化学元素特征[J]. 干旱区地理, 2020, 43(5): 1231-1241. [Xu Ruihong, Wu Fasi, Wang Wanfu et al. Chemical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inhalable particulates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Arid Land Geography, 2020, 43(5): 1231-1241.]

Urban tourism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unique resources in Dunhuang, China

Liu Qing¹, Yang Yongchun^{2,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3.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West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Dunhuang, a small-scale inland city in western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ounty to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a platform for worl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 node cit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mainly relies on its unique and brilliant resources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culture, and state policy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up. As a tourism governance model with a cultural position and unique resource endowment, this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rethinking for existing urban tourism governance an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Thus, based on interview recording texts, various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qualitative method of actor network, the emphasis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process of Dunhuang tourism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Dunhuang's tourism governance has main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at is, the flooding of inbound tourists,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infrastructure, centralized operation of the tourism market 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ternational mega-events. Additionally, the tourism mech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centralized operation, and urban marketing. 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is that Dunhuang'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s initially driven by global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Subsequently,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boom promotes notable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centralized governance. Ultimately its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stock repackaging fed back afresh urban tourism and marketing; 2)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global popularity of Mogao Grottoes and Dunhuang culture attracts large-scale inbound tourists, city government and Dunhuang Academy mobilize other actors to form an interests' alliance to realize the supply of Dunhuang tourism needs; 3) In the stage of centralized operation and city marketing, the city government monopolizes the city-owned tourism resources for centralized market operation. Equally important, in respond to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Silk Road (Dunhua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the city government develops Dunhuang cultural tourism through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stablishes a key node city on the Silk Road and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Dissent and bargaining mainly revolve around market regulation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land utiliz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esidents, and resource redevelopment; and 4) four driving forces promote Dunhuang tourism governance, Unique Resource Driven Heritage Tourism and Transformation Route in Dunhuang, unique tourism resource and cultural stock facilitate urban heritage tourism and transformation route in dunhuang, Dunhuang Academy invigorates the vit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Dunhuang grotto tourism, market accelerates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m provisio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lead the 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the stock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cultural assets.

Key words: tourism governance; unique resources; actors network; Dunhuang; urban transformation